



The Greeks and Greek Civilization

# 希腊人和希腊文明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 著

王大庆 译

*Jacob Burckhardt*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The Greeks and Greek Civilization

# 希腊文明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 著

王大庆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希腊人和希腊文明 / (瑞士) 布克哈特 (Burckhardt, J.) 著; 王大庆译.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书名原文: The Greeks And Greek Civilization  
ISBN 978-7-208-08103-1

I. 希… II. ①布…②王… III. 文化史—古希腊—通俗读物 IV. K 12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7489 号

责任编辑 马晓玲  
封面设计 罗 洪



世纪文景

### 希腊人和希腊文明

[瑞士] 雅各布·布克哈特 著  
王大庆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张 37.75  
字数 489,000  
版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103-1/K·1486  
定价 48.00 元

# 目 录

中译本序言 (郭小凌) .....	1
前言 (奥斯温·穆瑞) .....	5
序言 (奥斯温·穆瑞) .....	7
<b>希腊人</b> .....	45
第一章 导言 .....	47
第二章 希腊人和他们的神话 .....	58
第三章 城邦 .....	86
第四章 希腊人生活的基本特征 .....	115
<b>希腊文明</b> .....	185
第一章 介绍性的评论 .....	187
第二章 英雄时代 .....	196
第三章 赛会时代 .....	225
第四章 公元前 5 世纪 .....	284
第五章 公元前 4 世纪到亚历山大时代 .....	360
第六章 希腊化时代 .....	431
<b>附录 学习古代历史在思想上的必要性</b> .....	451
注释 .....	453
德文版原文和英文选译本相对应的页码 .....	539
参考书目 .....	540
索引 .....	543
译后记 .....	592

## 中译本序言

2000年早春，我在雅典大学校园书店里看到面世不久的布克哈特著《希腊人和希腊文明》一书英译本，遂即买了下来。

我已过了盲目阅读的年龄，知道为职称和生计写作的平庸洋人学者是多数，加之又是工薪族人，银两不多，所以在外国书店掏腰包前首先要考虑是否物有所值。见了布克哈特的书之所以出手，主要原因在于布克哈特先生的大名头。此前读过他的代表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译本，知道这是上了西方史学史文艺复兴文化史名家，没想到他还有厚厚一大本古希腊史的著作传世。

实际上，我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的印象并不算好。虽然阿克顿对该书赞誉有加，但我觉得布克哈特多半受19世纪哲学泛论的影响，主观的议论、顺手的联想较多，专业史学要求的详实引证偏少，且全书摊子铺得很大，章节段落之间缺少严密的逻辑联系，给人纷繁的感觉。

读了《希腊人和希腊文明》译者穆瑞的前言，方知这种写法乃是布克哈特治史的特点。他认为史学研究的目标是历史思想或观念，也就是喜欢“通古今之变”的通透见识，反感业已盛行的史料考据技术，把兰克等学者运用实证主义方法苦心孤诣求证出来的“历史真实”视为一堆“纯粹的历史事实垃圾”，浪费历史家的“精力”和“视力”。这种认识当然有它的合理性，因为兰克提倡的“如实直书”的实证目标把史

学工作者变为了历史的录入员，忽略了历史向来具有的启发心智、提升智慧的教谕作用。换句话说，兰克同传统史学的追求唱反调，布克哈特却反其道而行之，成为传统史学夹叙夹议方法的继承人和捍卫者，区别只是多了一些“议”。

对布克哈特的这一做法我能够理解却不以为然，因为史学的研究过程如果没有确认事实的首道工序，如何能构建出合理恰当、趋近真实的价值评判或思想观念？二者如果有机结合则对史学善莫大焉。孔德的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其实是对这两种偏向的适当修正。

《希腊人和希腊文明》一书当然还是布克哈特的风格。由于是在大学课堂中的讲稿，所以布克哈特思想的信马由缰更为明显，到处都是智力与史实接触碰撞之后擦出的思想火花，凸显出作者的主观介入。不细心的读者也能够轻而易举地发现，本书字里行间充溢着个人对古希腊文化的感受，其表达不加收敛掩饰，心到笔到，价值陈述胜过史实陈述。因此，这是一部个性十足、智力强劲的史著，就像柴可夫斯基的乐曲——别的作曲家的一个作品有几个令人心驰神往的乐句就不得了了，老柴的美妙乐句却四处泛滥——好听好读，容易把读者引入耐人寻味的分析和概括而不能自己，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认识古希腊文化的意味深长的入口。布克哈特说：“我们应该永远感谢希腊人对世界的洞察，在这里，他们与我们十分接近；在创造力的领域里，他们是如此伟大，这是他们的崇拜者所望尘莫及的。”我们也应该感谢布克哈特对古希腊文化的这种透心彻肺、如醉如痴的爱情，这使我们想追问为什么19世纪的许多欧洲知识分子会有这样一种情怀。

没有人很好地解答过这个问题，那时的知识分子只是倾尽全力地赞美古希腊人和他们的文化，比如恩格斯把希腊人称作“天才的小民族”，英国诗人雪莱则以复数第一人称认同自己和所有英国人“都是希腊人”。姑妄言之，还是轴心时代的希腊人对近代西方文明所作的非凡贡献折服了近代西方人。这些贡献包括自由、民主、法治、爱智、重德等基本价值观念，以及登峰造极的雕塑与戏剧艺术。在此基础上，今天西方的一些具体价值观，如公民社会、选举权、任期制、知情权、参与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教分离、文职人员管理军队和宗教事务、逻

辑思维和科学思维等等，都可以在古希腊人那里找到出处。这正是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被古希腊人俯视的蛮族后裔——西方的主流民族（盎格魯·撒克逊人、日耳曼人、高卢人、北欧人、斯拉夫人等）那么积极主动地认同古希腊文化为自己的文化祖先和价值源泉的根源。

但这毕竟是 19 世纪的事情了。现在的欧美学界，古典学日益滑向边缘，人们的眼睛偏爱鼻子前面的人和事，为何这部 100 多年前的著述，却仍能引起当代史家的注意，并被译成英文试图加以推广呢？这说明布克哈特的道德文章还没有过时，仍然可以满足现代人的需要。

布克哈特的世纪是一个驱动世界变革的、热火朝天、光怪陆离的世纪：人类生产力的革命性进步在一个世纪里发生了两次，从工人发明家到教授和知识分子发明家，快得使人文社会学者们都来不及整理和归纳；政治领域则继续着暴风骤雨般的革命和改良，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的咒符仍旧呼风唤雨，推动着变天的浪潮；共产主义运动从幽灵演变成各国资产阶级俱乐部恐惧的洪水猛兽；思想家和大学者的高论和自信比山高、比海深，人们的心头好像长满了草……在骚动的欧洲社会中，却有一个心如止水的历史家布克哈特，他沉浸在古典时代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文化遗产当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只解圣贤书，在字里行间发泄着自己对古典的那片衷情。这位教书匠在古希腊文化研究中获得了快乐，正如他所说，“人们不能对一个教师有太多的希望。但是首先，他应该使人们保持对精神造物价值的信仰。第二，他能够使人们相信，在这些造物中可以发现真正的快乐。”

历史的主要价值在于借鉴和参照。“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布克哈特在万丈红尘当中能够保持一份平静的心态，把研究和爱好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和快乐源泉，这给我们提供了一面照看自己嘴脸和内心的镜子。在这面镜子里，我感到了自己的低下和渺小，应该向布克哈特学习并感谢王大庆博士把这幅镜子进口到中国来。

郭小凌

2007 年 7 月 20 日





## 前言

1965年，我发表了我的第一个评论，它是关于雅各布·布克哈特 ix  
关于希腊文化的演说的一个拙劣的选译本。摩西·芬利（Moses Finley）写信向我表示祝贺，并透露说他和沙拉·斯特恩（Sheila Stern）正准备出版一个完全不同的选译本。正是布克哈特促成了我与那个时代在英语世界的古史研究领域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三位伟大的历史学家——美国的芬利、新西兰的西米（Syme）和意大利的摩米里亚诺（Momiigliano）——保持了二十年的友谊。

当摩西在1986年去世之后，完成了一半的译文又被拖延了很多年。在他的论文中没有留下任何有关这项工作的记载。但是到1989年，我很高兴地收到了沙拉·斯特恩的一封信，说她最近找到了前几部分的手稿，进行了重新的录入，并希望继续下去。她问我对于挽救这项耽误了很长时间的工有没有兴趣，是否接受这本书的编辑工作？由于我在运用布克哈特创造的“希腊人”（Greek man）的概念的过程中刚刚重读了他的著作，我答复说，没有任何事情比协助完成这部杰作的编辑更令我感到高兴的了。我们对摩西完成的这个选本进行了修订和增补，并怀着极大的热情开始了翻译工作。因此，我们得以最终在布克哈特去世一百年，同时也是他的演说集（1898—1902年）首次发表的一百年之后，把布克哈特对希腊文化史的看法呈现给英语世界的读者。在这个译本完成的过程中，我们始终亲密合作，我主要负责篇目的选择和介绍，

而沙拉·斯特恩则主要承担翻译工作。

x 我们对出版者斯图亚特·普洛菲特 (Stuart Proffitt) 和托比·蒙蒂 (Toby Mundy) 表示感谢, 他们对于这项工作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鼓励。我们还要感谢大卫·马克林托克 (David McLintock), 他协助校订了译文, 感谢安娜·布朗 (Anna Brown)、约翰·苏登 (John Sugden) 和吉登·尼斯伯特 (Gideon Nisbet) 对正文和注释所作的编辑工作。我们还要对斯蒂芬·莱恩 (Stephen Ryan) 编制了索引深表谢意。

我们把这本书献给上述两位学者, 以示纪念, 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这本译著的早期准备工作。

奥斯温·穆瑞 (Oswyn Murry)

1997年8月8日

## 序言

雅各布·布克哈特（1818—1897）的一生跨越了19世纪历史编纂的伟大时代。在青年时代，他在柏林受到了那一代学者的教导，他们反对黑格尔的历史观念，创造出历史实证主义（historical positivism）；他的老师包括希腊史家奥古斯特·柏克（August Boeckh）和J. G. 德罗伊森（J. G. Droysen），现代历史和文献研究的伟大奠基者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后来布克哈特曾在1872年受邀接替他在柏林的教席）。他与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属于（尽管以一个瑞士人的特有的间接的方式）革命的“1848年代”，这是19世纪欧洲伟大的分水岭。在所有的哲学家中，他最热衷于叔本华，是青年尼采的朋友和同事；在巴塞尔的其他同事中他所敬佩的人还包括人类学家J. J. 巴霍芬（J. J. Bachofen），<sup>[1]</sup>语言学家奥托·里贝克（Otto Ribbeck），他的学生和传人艺术史家海因里希·沃夫林（Heinrich Wölfflin），哲学史家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他（正如我们看到的）对像维拉莫威兹（Wilamowitz）这样的年青一代的学者十分不满，因为后者试图创造出一种语言科学，并把它提升到人类精神的历史之上：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维拉莫威兹的第一本书就对尼采的“未来的语言学”（1872年）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而年轻的罗德（Rohde）对尼采的辩护也是很客气；就

像下文提到的那样，处于鼎盛时期的维拉莫威兹在布克哈特去世以后终于可以用极为傲慢的言词大肆攻击布氏的著述了。然而，正是这本《希腊文化史》现在却成为了用现代的方法研究希腊世界的奠基之作；成熟阶段的维拉莫威兹对布克哈特的误解与青年时代的他对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所产生的误解十分相似。

## 生活

xii 布克哈特 1818 年出生在巴塞尔，他的家庭是巴塞尔的一个大的市民家族的一个小的分支：自从 15 世纪，布克哈特这个姓氏在这座城市就十分显赫。<sup>[2]</sup> 他的父亲是一个新教的牧师，受到施莱尔马赫 (Schleiermacher)\* 的神学的很大影响。巴塞尔是一座贵族城市，保守而日渐繁荣，同时远离欧洲动荡的政局；布克哈特就是这座城市知识界的一员。布克哈特在巴塞尔获得了一个神学学位，但没有充任教职，青年时代的学习使他坚信基督的生平是一个神话。1839 年，他到了柏林，师从兰克、柏克和德罗伊森学习历史；但他最要好的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朋友是弗兰茨·库格勒 (Franz Kugler)，一位研究新兴学科艺术史的波希米亚教授。在他的另一位朋友格特弗雷德·金克尔 (Gottfried Kinkel) 身上，他发现了最后一丝伟大的浪漫主义；他进入了金克尔的情妇、离婚的乔安娜·马修克斯 (Johanna Matthieux) 的圈子，还有贝蒂娜·冯·阿尼姆 (Bettina von Arnim)，她曾经爱上了歌德，在柏林与她的姐姐——伟大的法律史家 F. C. 冯·塞维尼 (F. C. von Savigny) 的遗孀——住在一起。在金克尔与乔安娜于 1844 年举行的婚礼上，布克哈特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但是在金克尔随后成为一个革命者之后，他们的关系疏远了。1848 年金克尔被判处死刑，在他妻子的帮助下逃亡到伦敦，在那里乔安娜最终自杀身亡。

---

\* 弗雷德里克·施莱尔马赫 (1768-1834)，德国神学家。——译者注，下略

1844年，布克哈特安全地回到巴塞尔，在那里，他为一家重要的保守主义报纸《巴塞尔时报》(*Basler Zeitung*)做了18个月的编辑。他开始在大学发表有关绘画史的演说，由于批评占统治地位的拿撒勒画派(Nazarene School)而遭到了宗教界的攻击，这个画派由一些在罗马的德国宗教画家组成，被视为前拉斐尔时代后期的楷模。1852年，他辞去了大学的职位，前往直意大利，在那里他写出了受到巨大欢迎的《向导》(*Cicerone*) (1854年)，“一本欣赏意大利艺术的指南”，这本书至今仍然是了解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三代艺术家创作的建筑、雕塑和绘画的标准入门读物，在他的有生之年就再版了6次。以此为基础，他得到了苏黎世工艺学校(Zürich Polytechnic)的教职。1858年，他被任命为巴塞尔大学的历史教授，他可以在大学和高级中学同时发表演说，从1874年开始，他还被聘为艺术史的教授。第一任教职延续到1885年，第二任延续到1893年。不论在历史和艺术史领域他都是一个虔诚而勤奋的演说家，每周授课达10小时，此外还为普通公众讲很多次。

布克哈特终身未婚(尽管在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堕入爱河，为一个父母不同意他们交往的女孩子写过诗歌)；他的年轻的德国朋友们离他而去，在他三十岁时他承认自己已经是孤身一人，没有了什么奢望。他有很少的几个保持联系的密友，在一家面包店上面的两个房间里过着一种循规蹈矩和平淡无奇的生活，把自己全部献给了他的演说、著作和旅行。

在政治上，布克哈特是一个天生的保守主义者，他讨厌和蔑视新的工业化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在他自己的生命过程中，他预见到了一个“可怕的简约”(terribles simplicificateurs)和蛊惑民心的政客时代的到来，它将控制大众，给欧洲带来灾难。这种悲观的保守主义是一个善于反思的历史学家的典型特征，他对当时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的热情进行嘲讽并保持距离。就他预见到工业社会将会朝着国家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极权的大众政权方向发展而言，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超越他的时代的预言家，与历史的潮流背道而驰。但他不是一个政治思想家；不论如何明晰，这些偏见仅仅是一个无心的观察者的一些遗憾，这些遗憾

来自于他自己的家庭曾经明确归属的贵族阶层的衰落。因此，在这里就会说到他对阅读报纸的恶习以及人们使自己沉迷于躁动的现实生活的攻击。<sup>[3]</sup> 其实，要紧的并不是布克哈特的政治观点或是他对未来所抱有的悲观主义态度，而是他对历史方法的想法；早在 1846 年他就这样写道：

但是，我亲爱的朋友，我对自由（Freedom）和国家（the State）都没有什么感觉。国家并不是由像我这样的人构成的；尽管只要我活着，我就会对我的邻居表现出友善和同情心；我会成为一个好的个体，一个有感情的朋友，一个精力充沛的人；我对这一发展方向还是有一些天分，并且愿意成为这样的人。我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做不了什么；我对它的态度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冷嘲热讽；重要的是我所从事的事业……我们都会消亡，但至少我想去发现我是为了什么而消亡，它就是欧洲的古代文化。<sup>[4]</sup>

xiv

所以他戴上一副艺术爱好者的面具，沉浸在他的工作和他为数不多的朋友中，全身心地投入于欧洲文化的研究，也就是他所指的过去的艺术、文学和精神成就，把它们放到当时的语境中，把它们解释为历史力量的产物。历史是对往昔的沉思：“闲暇是沉思之母和灵感的源泉”（写于伦敦）；“倾听万物的奥妙。一种沉思的情绪。”“那些文献的搜集者哪里有时间去进行沉思呢？为什么，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心中的修昔底德是个什么样的人！不要再给别人添乱了。”<sup>[5]</sup>

## 早期著作

在 19 世纪 40 年代，当布克哈特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就十分反对当时流行的历史观念，“现实的单面性只能产生一种充满偏见的历史，就像充满偏见的诗歌和充满偏见的艺术那样。”<sup>[6]</sup> “对我来说，背景是首

先要考虑的因素，这是由文化史来提供的，而这正是我想献身的事业”，布克哈特在1842年这样写道。<sup>[7]</sup>从一开始，他的历史观所关注的就不是行动、事件或那些看上去促成这些事件的伟人，而是这些事件发生时的文化背景，这些背景或许可以比把它们归之于个人的行为或偶然性的作用更能够对历史上的变化给予令人满意的解释。君士坦丁是如何使罗马帝国皈依基督教的？这对当时的人意味着什么？这是他的第一本书《君士坦丁大帝时代》（*The Age of Constantine*, 1852年）所探讨的主题；一个世纪以后（1949年）它被译成英文，<sup>[8]</sup>在我们这一代历史学家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从吉本（Gibbon）开始，历史学家们就对古代世界晚期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是他教会了我们如何把一个时代当作一种文化现象，而不仅仅当作某种政治和权力结构，或政府组织来看待，就像更为晚近的历史学家所阐释的那样。

这本书是围绕三个主题进行编排的——政治、宗教和文化。作为一种对蛮族入侵和内部混乱的抵抗力量，这个时代的政治必然是一种邪恶的东西。文化在衰落的过程中：文学沦落为权力（在颂词中）和宗教的附庸；艺术是宗教的附属品：“有关的神话成为了普通观念的象征性的外壳，从长远来看，果肉与果壳的分离只能对艺术造成伤害。”<sup>[9]</sup>哲学是一种孤独的事业，即使像特米提乌斯（Themistius）所言，“哲学演讲的价值并不会因为在孤零零的一棵梧桐树下只有蝉儿们在倾听而有所减损。”<sup>[10]</sup>基督教会已经成为一个有力量的联合体。在这幅画中，君士坦丁只是他的时代的一个人，几乎与他所带来的思想上的革命没有关系；他牢固地隶属于一个异教和基督教信仰相混合的世界，他的皈依只是认可了两种早已存在的文化之间所发生的一次平等的正式分化。问题的核心就在布克哈特对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思想方式的描述上。古代晚期的异教是一个仪式和信仰的庞杂序列，试图赋予精神的世界以意义：

基督教注定最终要征服世界，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无与伦比的

简单回答，它对那个动荡时代的人们所深深关注并试图寻找解决办法的所有问题都给予了印象深刻和令人信服的确切回答。<sup>[11]</sup>

布克哈特最有名的书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1860年），他的声名至今仍然建立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剑桥大学现代历史研究的奠基者阿克顿爵士（Lord Acton）把它描述成“有史以来关于文明史的最具洞察力和最为精妙的论文”。<sup>[12]</sup>实际上，这本书仍然在塑造和挑战着此后解释欧洲历史核心现象的所有努力。布克哈特试图对那个时代在发生作用的新生力量以及这些力量之间是如何相互联系的作出分析。第一部分是关于政治和战争，有一个充满争议的标题，“作为艺术工作的国家”。这就是说，政治生活不再由传统的政府组织或者现代历史学家所揭示的那些根本力量所决定，而是由宣传者的有意识的知识所决定，他们宣称存在一种科学或政府的艺术，可以通过实验或思考被发掘出来。接连发生的谋杀、背叛和暴政都是人们信仰理性而非传统的力量所造成的后果：正是一种对历史事件的看法把马基雅维里的新政治科学摆在了中心的位置；然而不论其结果是多么混乱和困苦，布克哈特还是试图证明，政治从未被如此富于实践精神的领导者引领到这么高的知识水平。

xvi

第二个部分描述“个人的发展”。这是19世纪黑格尔以后的思想一直关注的题目：现代的个人主义观念是如何从部落和宗教的历史阶段中产生出来的？布克哈特并没有解释，他只是描述了个人从他们的社会中分离出来的动因，“普世人”（the universal man）的理想和现代的荣誉观念，还有其对立面，即现代的机智和讽刺观念：

人对自身的意识只是作为是一个种族、集团、党派、家庭或联合体的成员——这种意识只能通过一些普遍的分类而形成。在意大利，这层面纱首先被揭开；对国家以及这个世界的所有事情的一种客观的处理和考量都具备了可能性；与此同时，主观的方面也使自己得到了相应的强化；人成为一个精神的个体，他自身



也认识到了这一点。<sup>[13]</sup>

所以布克哈特坚信，“不仅是古代的复兴本身，而是它与意大利天才的结合，二者相互作用才取得了征服西方世界的成就。”<sup>[14]</sup> 他的第三个部分是关于“古代的复兴”，以及通过与古代文献和文化相接触而产生的新人类的教育问题。新世界的发现被安排在与内在精神的探索、诗歌和传记文学的发展以及外部世界的描述相关的一章里，题目是“人和世界的发现”。

在“社会和节日”一章中，布克哈特描述了男人和女人如何真实地生活在这个新世界里，礼貌的原则，优雅的举止和外部的装饰，语言和谈话的风格，性爱，体育锻炼和音乐，朝臣的男性理想中的男女平等，官方的大众节日的发展，其原型是古代的凯旋式和酒神节的观念。最后的“道德与宗教”这一章试图把这个新时代与中世纪的宗教力量联系在一起，后者从未被完全取代，所以这最后一章所关注的是古代与现代迷信的混合物，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信仰的崩溃。

这部著作标志着一种新的历史解释模式的最终确立，这就是德国学者所谓的“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sup>[15]</sup> 每个主题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得到阐发，它一方面描述和关注细节，另一方面与对一些基本要素的根本性看法相呼应，通过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文化的观念。在这部著作中，布克哈特能够抛弃掉人类精神发展历史的哲学问题中固有的决定论，正如黑格尔在使用当代的哲学概念（比如国家、宗教和个人）去建构他对现实的描述时所阐明的那样。与此同时，他也避开了历史实证主义的陷阱，后者坚持认为历史的意义包含在一个因果关系的链条中，包含在对确切事件或事实的真与假的证明当中。对布克哈特来说，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并不在于寻找它们的缘由，而在于发现它们的相互关系，寻找原因只是一种片面和伪科学的两维的思想方式。社会并不是一个由事件组成的线性系列，而是一个高度复杂和相互作用的系统，任何因素的某种变化都可能会对其他因素造成多重的影响。而且，人们的信仰和行为本身远比他们的信仰是否真实或是否更有用更为重

xvii